

非虚构写作亦应注重文学性

程惠子

双塔

和国

《水浒传》人物绰号拾趣

马绍民

人物的绰号,是《水浒传》这部著名古典小说的一大特色,对塑造人物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分析这些绰号,有的比较好理解。比如称宋江“及时雨”,是因为他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经常在他人遭遇困厄时及时出现,给予救助和帮助。称公孙胜“入云龙”,是因为他身怀道术,善呼风唤雨,如云中龙一样高深莫测。称石秀“拼命三郎”,是因为他排行老三,又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而一旦出手,又往往两肋插刀,把生死置之度外。称花荣“小李广”,是因为他武艺高强,尤其箭术可与名将李广媲美。称周通“小霸王”,是因为他常以霸王项羽自况,也有把子力气,不过用的不是地方而已。

诸如如此的绰号,占《水浒传》人物的比例最高。但有些人物绰号就不太好理解,甚至容易造成歧义。比如阮小五绰号“短命二郎”、孙立绰号“病尉迟”、薛永绰号“病大虫”、陶宗旺绰号“九尾龟”、蔡庆绰号“一枝花”、鲁智深绰号“花和尚”等等。

阮小五人称“短命二郎”,难道是他活得寿命不长吗?碣石村“阮氏三雄”中,阮小二和阮小五都在征战方腊中死去,只有阮小七一人得以回到家乡,最后寿终正寝。阮小五死时年纪不大,但绝不是梁山好汉中年寿最短的。

虽然阮氏兄弟的具体年龄小说中没提,但是根据百回本《水浒传》的提示,梁山兄弟受招安后征讨方腊一战,“九纹龙”史进中箭身死时不过29岁,因此只称阮小五“短命”,说不通。阮小五的名字已经表明,他也不是二郎。再说,这绰号又不是死后追加的。

“短命二郎”,是自我标榜或旁人夸赞本领高强、能够让二郎神杨戬都活不成的意思,用来形容一位狠角色,相当于中药无患子,悬挂门上能辟邪,俗称“鬼见愁”。这种绰号的语法结构,是古汉语中常见的“使动用法”。如“惊天地、泣鬼神”,意思是事迹或壮举感动天地,“可使天地为此震惊、能使鬼神为之哭泣”,而不能理解为“因天地而震惊、为鬼神而哭泣”。

绰号“病尉迟”的孙立,落草梁山前为登州兵马提辖,加之他身高八尺,惯使一枪一鞭,有万夫不当之勇,即使门神尉迟敬德将军见了,孙提辖也能使他“病”(痛苦)。“病尉迟”,是“使尉迟恭得病”,而不是生了病的门神。

知道了“病尉迟”的意思,薛永绰号“病大虫”就好理解了。有拳棒功夫的军官之后薛永,不是一只病虎,而是可以让老虎生不如死的猛士。

当然,能让二郎神、门神和兽中之王心生畏惧的说法,都是夸张和打比方,与形容一个人身体强壮时说“虎背熊腰”差不多。

梁山好汉,本为地道庄稼汉的陶宗旺,江湖人称“九尾龟”。这个绰号不是骂五短身材的他是乌龟,二是讥笑他行动迟缓如龟爬,三是赞美他寿命很长(古人认为有九条尾巴的龟岁数为三千年,但陶宗旺在征讨方腊之战中死得很惨),而是称赞陶宗旺技艺超群,是个招惹不起的人物。因为九尾龟即神话传说中的九尾神龟,这种龟,一只尾巴管一个州,九只尾巴管九州。

提到拳头刽子手蔡庆“一枝花”的绰号,乍一看,会让人认为他一表人才,如花似玉。其实,不过是蔡庆爱在头上插一枝花而已。

这不是蔡庆一个人的爱好,宋朝男人普遍有头上簪花的审美取向。这与风流风情无关,与身份身世无关。《宋史·舆服志》说,男人簪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宫廷礼制。

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作诗一首《吉祥寺赏牡丹》,其中有一句“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意思为人老把花插在头上不觉得羞,害羞的是花。

鲁智深的绰号“花和尚”中也有一个“花”字,这可不是说鲁智深的大光头上可簪花,也不是他不务正业、轻佻轻浮,而是这位彪形大汉身上刺有花团锦簇的图案。



临摹敦邦水浒人物阮小五 马绍民 绘

经典漫谈 (8)

主义(‘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当作‘唯一美德’——但把意思完全弄拧了,以致反讽意义上的‘美德’成了美德本身”。作者试图通过“粗糙美学”的叙述抵达真实,但效果却不甚理想。

当真实感被反复强调且被看作一部作品的衡量标准时,虚构与非虚构就成为了二元对立的另一端,为营造真实感而堆砌的各类素材,也在乱序的编排中冲散了文本本身的整体性和文学性。除此之外,如作者秉持着以真实为纲的创作理念,则更容易陷入“建构真实”的窠臼。《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在后记中坦陈,如不写张医生与王医生,就会写另一套“组合”,“但是,不管怎么写,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在过去那个体系崩塌之后,我们最后还是会写到那个沈阳”。如果真实在下笔之前已然固化成型,那么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自我生长则变得不再可能,向脑海中的“真实”靠拢之时,现实中的真实很可能已经被放弃。

非虚构写作不应该是一个论证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尽管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人物抑或时代都是有客观现实基础的,但写作毕竟是一项具有主体叙述性的活动,写作者的立场决定了他所书写的“真实”必然是有限的且有所取舍的,故而在文本中刻意强调客观真实似乎并无太多必要。

那么真实感的实现如不借助外部文本的证明,则必须通过自身的叙述在内部达成。换句话说,非虚构写作需得借助一定的写作技巧来实现文本内部的圆融,确保文本的整体性与可读性,且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尽量保证以不折损真实性为代价。而这些写作技巧很可能来自已然相对成熟的虚构文学,例如小说、散文。

2023年10月,非虚构作品《五爱街往事》出版,在此之前,书中收录的作品发表在一个公众号上,集合成为作者三胖子的专栏“风雨五爱街”。与《张医生与王医生》中

“我”作为旁观者的站位不同,三胖子简介中写道:“2002年辞去公职下海,进入沈阳五爱市场经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记录身边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时代。”当“我”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所经历的故事,此处的第一人称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我”与“我”写的人物身份无太多差异,都是五爱街上摆摊的小人物,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写作,令作品自然摆脱了如社会调查报告般的模式,也摆脱了居于高位的观察感。

鉴于公众号连载文章的属性,《五爱街往事》文本本身依然存在太过口语化、文笔太过粗糙的缺陷。但却令人看到非虚构写作一种发展的可能:当虚构文学的技巧进入非虚构写作,无形中打开了文本内部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壁垒,也令文本摆脱了“真实与否”的讨论,从而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非虚构文本的文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在谈及“非虚构写作”的当下境况时提及,非虚构不是“反虚构”“不虚构”,而是“不仅是虚构”。它需要原材料,而对这个原材料的书写和加工,还需要借助虚构和想象力。否则,会导致“一种粗糙的、形而下的文学社会学倾向”,作家与记者毫无区别,非虚构作品与报告文学毫无区别。虚构的手法和技巧正是矫正“非虚构写作”粗糙化倾向的重要工具。

“非虚构”一词令人很容易将其看作虚构的反义词,从而着意强调文本的真实,远离虚构的一切,乃至放弃对虚构手法的借用。事实上,文体的区隔有时并没有硬性的界限,正如学者一早指出,无论是小说、散文、历史话语或者非虚构写作,均不存在固定的、始终如一的标准形态。既然非虚构写作尚为边界模糊的通用语,不如就令其在动态中发展下去,不必因对“真实”的追求限制了文体。或许在未来,虚构与非虚构两种形式能够相互支持,在融合中共同抵达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遣怀吟叹古城新生

——《唐风集》里的咏太原诗(上)

刘小云

今年是太原解放75周年。本版特约作家、诗人刘小云解读《唐风集》中的若干诗篇,从中可以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原解放后一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建设成就。——编者



图①:今五一广场首义门
图②:文瀛公园老照片
图③:迎泽大桥老照片
图④:迎泽宾馆老照片
(均为资料图)

一本198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降大任、张成德选编的《唐风集》,在我的书柜里静静地躺了30多年,近来因为友人点名想看看此书,我才翻开细看,感觉到山西早年的诗人诗作丝毫没有陈旧感,扑面而来的是历史厚重感。书中收有46位诗人的390首诗作,这些诗人的名字大多数是报纸刊物上常能见到诗的机关和院校的老牌知识分子,也多是山西诗词学会成立的发起人,他们都写旧体诗,皆用平水韵,题材广泛,直抒胸臆。从这本《唐风集》中能看解放后的太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老太原人,从太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过来,对太原的变化有目共睹。那个时候的太原是什么样子呢?我父亲刘秀峰(时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太原文艺》上发表了他在写的第一首旧体诗《咏太原》(1957年),这首诗恰恰就被收入《唐风集》:

解放才经几度秋,旧城新建显鸿猷。
当年旷野兴工厂,昔日沟壑起楼楼。
市辟通衢开广路,桥成迎泽渡汾流。
若非双塔东南峙,离客不知是并州。

1957年,太原解放刚刚8年,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旧城新建,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宏伟。那时候,在河西地区新建了许多工厂,太原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城市之一;在遍地沟壑之上,建起了高楼,我们熟悉的迎泽宾馆东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设起来的。过去的市区多为了字路,那是因为北宋镇守太原的大帅潘仁美修建太原城时,为了“钉破并州,街巷都作丁字形”。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者打通了字路,东西为街,南北为路的格局逐步形成,贯通汾河东西的迎泽大桥和迎泽大街,也建设于那个阶段。太原的变化太大了,如果不是高高的双塔立在东南方位,离客哪知这就是当年的并州城呢?双塔,无愧太原之标识。

这首诗我太熟悉了。那时还不足10岁,但我背下了这首诗,尤其是最后一联,每次坐火车,进太原站时,探头望望窗外的双塔,怎能不爱自己的城市?

山西大学教授郝树侯先生写有《太原新景四首》(1958年):

五一广场
万紫千红闹晓春,朱楼脉脉对高墩。
老槐为问重来燕,曾识当年首义门?
柳巷南路
棋布星罗丁字街,任它棘手苦安排。
新开柳巷南头路,封建余威安在哉!
迎泽桥
新堤高压市中,绿柳婆娑映碧空。
迎泽桥横汾水上,风驰百辆利交通。
迎泽公园
连榭孤亭一苇横,红桃绿柳掩丹楹。
当年曾是荆榛地,新辟公园气势宏。

四首赞美太原新景的诗,写的是我们熟悉的五一广场、柳巷南路、迎泽桥和迎泽公园。《五一广场》诗中,“高墩”指纯阳宫的假山。转句和结句“老槐为问重来燕,曾识当年首义门”,厚重感出来了,五一广场此处原来是首义门,辛亥革命胜利后,将原承恩门改为首义门,首义门在解放战争中受到损伤,被拆除,改为五一广场。此诗告诉读者,这里原来是首义门,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的新军就是从这里打进城内,进而冲向抚台衙门,结束了清王朝在山西的封建统治。诗人想不到,2020年,五一广场改造,首义门作为标志性历史建筑得以复建,成为文化太原的载体和坐标。

《柳巷南路》中“新开柳巷南头路,封建余威安在哉”,是指将原来柳巷南路的丁字形路打通了,现在的青少年在四通八达的街巷中,还知道这段历史吗?

《迎泽桥》中“迎泽桥横汾水上,风驰百辆利交通”,告诉读者,迎泽桥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汾河水上架起桥梁,桥通迎泽渡汾流,太原的交通发达起来了。

《迎泽公园》写公园建设于“荆榛地”之上,就是一片荒凉之地。这是太原解放后建设的第一座公园。

曾任山西省政协文史办主任的田际康先生,写有《井门杂咏三首》(1984年):

满街花
古城无日不更新,尤喜街头四季春。
绿树成荫花列阵,家家都是护花人。
闹农民入市建高楼
三晋云山竞比高,唐明八角堪称豪。
忽闻郊外农民至,欲借晴窗卖李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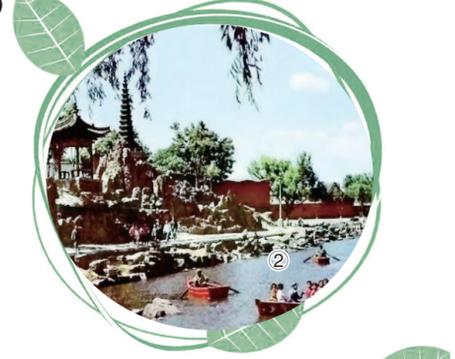
儿童公园
文瀛湖畔有吾家,少小湖边拍水花。
五十余年过去了,欣看孙辈坐飞车。
写在近40年前的诗,已经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太原的市容面貌。

建在迎泽大街的三晋大厦、云山饭店、唐明饭店和迎泽宾馆八角楼,是当年太原市最亮丽的几座现代化建筑,落在诗中,用了“竞比高”和“堪称豪”,更显高端。这个时期,农民开始进城,做点小买卖,乃至加入建筑工人大军,他们是借着新政策而走向城市的。

文瀛公园,地处海子边,后来叫儿童公园,是太原市最早的老园,立在文瀛湖畔。生活在文瀛湖畔50多年了,作为老人,他能看到孙辈在此玩乐“坐飞车”,该多欣慰。

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写有古风《井门行》(太原建城一千周年,1982年):

高楼联接凌空起,九衢纵横平如砥。
电车汽车脚踏车,夕夕奔驰如流水。
古城不见见新城,聊从古藩溯历史。
赵宋当年平北汉,晋阳名都一朝毁。



火焚水淹无子遗,唐明旧村辟新址。
尔来倏忽已千年,几度沧海变桑田。
山川形胜争拓土,太原子弟勇守边。
可怜屈辱起家王,常使英雄血泪涟。
金瓯辽后一北国,设为重镇辅幽燕。
强元铁骑成一统,收归腹里不备边。
明清两代无大故,人祸天灾仍相连。
直到人民得解放,始教历史换新天。
吁嗟乎!
隋唐杰构古晋阳,雄踞汾上连三城。
宋后新城城差逊,“锦绣”亦曾著名。
但得政通人和睦,群力能使河岳平。
低徊往事今鉴古,封建帝王何足数!
今朝开辟新天地,环顾寰宇谁敢侮!
这是一首古风诗,主题宏大。宋太宗将晋阳城焚毁后,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在唐明锁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新的太原城,至1982年,已有一千年。这首诗写太原建城一千年,由新城入笔,高楼联袂,九衢纵横,电车汽车脚踏车,朝夕奔驰似流水,进而追溯古城。古城如何来,聊从古籍一一道来,直到人民得解放,始教历史换新天。然后,感慨,隋唐杰构古晋阳,河西、河东,还有中城,古晋阳雄踞汾上连三城。结论,“低徊往事今鉴古,封建帝王何足数!今朝开辟新天地,环顾寰宇谁敢侮!”有千年历史的太原城,终于迎来新天地!
这首诗立意高古,风格庄重,感情充沛,读来韵味十足。